



【言为心声】

短期内政府应当继续实施储蓄经济发展模式,不断地提高储蓄存款的利率水平,减少存贷款之间的利率差。

# 储蓄经济模式对转型期中国更有利

乔新生

长期以来,储蓄率过高始终是很多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的基本判断。一些经济学家大声疾呼,应当鼓励消费,以消费拉动经济的增长而不是投资拉动经济的增长。

这种观点存在许多可疑之处。消费是一个十分宽泛的概念,如果一个国家的国民热衷于消费,那么,这个国家就会出现信用经济;如果信用破产,那么,整个国家的经济体系就会出现危机。在讨论经济增长的时候,不能把投资、出口和消费相提并论,因为经济增长的诸要素中,投资始终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力军。如果没有投资,那么就不可能有实实在在的消费。

之所以讨论这个问题,是因为最近一位经济学家对中国长期形成的储蓄经济发展模式持怀疑态度。按照这位经济学家的说法,中国消费过低储

蓄过高是个伪命题。他的理由是中国的数据大大低估了居民的居住消费,官方的统计数据也不能涵盖公司的账户付费私人消费(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公款消费),再加上在抽样调查的过程中,对一些实物消费可能没有计算在内。因此,中国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并不低。这种分析问题的方式令人耳目一新。

众所周知,住房消费始终是中国居民消费的主要支出,但是,很长一段时间,政府统计机关在统计居民消费开支的时候,并没有把住房消费计算在内。这不是政府有意隐瞒,而是因为住房消费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购买住房可能是为了消费,也可能是为了投资。此外,中国是一个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国家,虽然从平均数字来看,居民购买住房的支出比重非常大,但是,具体到各个阶层而言,住房支出在整个居民消费支出中的比例会呈现出

明显的差异。在讨论中国经济结构的时候,千万要避免“平均数陷阱”,不能把少数人住房投资行为看作是绝大多数居民的住房消费行为,更不能把少数人在房地产领域的巨额投资,看作是拉动中国消费经济的重要力量。

从整体而言,中国的经济结构和西方信用经济国家完全不同。无论是改革开放之前还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经济都呈现出明显的储蓄经济的特点。中低收入阶层将自己的存款交给银行,银行以贷款的方式获取利润,然后将其中的一部分交给储户。银行依靠存贷款的利率差获取高额的收益,而贷款企业则利用银行的贷款获得其他利润。在通货膨胀现实存在的背景下,这样的经济模式对于中低收入阶层来说是不利的,正因为如此,一些学者主张发展消费经济,更多的是从人文关怀的角度出发,提醒中低收入阶层的居民注意通货膨胀的现象,

不要因为盲目储蓄导致自己的血汗钱不断贬值。

现在在中央政府已经开始对中国的金融市场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通过实施存款利率浮动政策,鼓励商业银行为居民提供更好的储蓄服务,真正做到让利予民。但是,这项改革不可能一帆风顺,因为长期形成的金融管理体制以及金融市场上客观存在的垄断现象在短时期内很难改变。如果不能有效地控制通货膨胀,那么,中低收入阶层的经济利益将会进一步受到损害。

部分学者提出,应当鼓励中国居民信用消费,以信用消费抵消通货膨胀所带来的经济损失,以信用消费拉动中国经济的增长。笔者无法想象,在中国这样一个刚刚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的转型国家,如果出现大规模的信用消费,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信用消费是建立在收入相对稳定基础上的一种消费模式,少数学者干脆把信用消费与中产阶

级联系起来,认为如果没有稳定的收入,那么,信用消费将是不可持续的。当前中国正处在经济结构的调整过程中,居民的收入处于不稳定状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推行的一系列所谓结构性改革,彻底打破了传统的收入稳定结构,但却没有建立新的收入稳定体系,如果在这个时候大规模地推广信用消费,那么,不仅会增加金融风险,同时也会增加消费风险。

因此,短期内政府应当继续实施储蓄经济发展模式,不断地提高储蓄存款的利率水平,减少存贷款之间的利率差,让更多的资金进入到工业企业,推动工业企业扩大生产规模,增加工作岗位,创造更多财富,提高职工的收入。只有这样,才能形成良性的经济发展模式。在设计中国经济发展路线图的时候,不能东施效颦,不能把西方国家具有明显外部性的经济发展模式照抄照搬到中国。  
(作者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



【经济解释】

货币制度出了问题,管制短期资金流动可能反而是经济自由。

# 泡沫化与高杠杆化的经济度量

谢作诗 张原浩

经济到底是不是泡沫化,我们不能依据价格高低来判断。而杠杆隐藏在微观主体之中,是不是高了,看不见,摸不着。为此,经济学要寻找可观察、能度量的指标来进行间接度量。根据购买力平价理论,如果不考虑资产市场,那么货币“对内贬值、对外升值”这样的事情不可能长期存在。因此货币“对内贬值、对外升值”,一定是资产市场发生了什么。

事实上,正是资产市场泡沫化导致了货币“对内贬值、对外升值”。货币天然地是逐利的,要流向收益最高的地方。当资产价格百分之五十乃至百分一百地上涨的时候,钱就会流向资产市场。当预期资产价格上涨时,热钱会流入,流入的热钱又加剧资产泡沫和

汇率升值,而资产泡沫和汇率升值带来的高收益再吸引更多的热钱流入,从而形成一种螺旋叠加式的上涨,最终汇率越升越高,资产泡沫越吹越大。在世界货币超发、流动性泛滥的时代,一国资产泡沫化,热钱流入可享受双重收益:一方面通过在资产市场享受资产价格上涨带来的回报,另一方面还额外获得汇率上涨后带来的汇率升值的收益,货币“对内贬值、对外升值”的现象便出现了。在这样的时代,货币升值再也不能降低国内通货膨胀,反而会加剧国内通货膨胀。

经验上,货币“对内贬值、对外升值”现象不应该只是发生在中国,那些国内资产价格过快增长的新兴国家,也应该出现货币“对内贬值、对外升值”的现象。现实是不是这样呢?

货币超发,流动性泛滥,那些缺乏

供给弹性的商品就会资产化并形成泡沫。由于资产价格上涨反过来会产生更大的资金需求,因此愈是扩张货币,资产价格愈是狂涨而得不到控制,资金需求愈强,从而利率就会越高。主流经济学认为扩张货币可以降低利率,但实际上并非总是这样。

在世界货币超发、流动性泛滥而国内又资产泡沫化的时代,扩张货币不但不会降低利率,反而会提高利率。近年来,民间利率高昂,其实不是钱少的缘故,而是钱多的缘故。实体经济经营困难,也不是钱少的缘故,而是钱多的缘故。当资产价格连续攀升并且提供了比投资实体经济更高的回报时,钱反而要大规模流出实体经济。实体只是个平台,融得了钱,还是炒房炒地。当房地产等资产价格大涨的时候,利率要上升,汇率要升值。是否泡沫化仅从价格不好

观察,但是当货币宽松而本币升值、利率高昂,一般来说是泡沫化了。

泡沫化与高杠杆化紧密联系。泡沫化中,没人愿意让钱久留手中,同时更多的人更希望借到钱。一笔资金,甲花出去,变成乙的收入和存款,经过金融中介,又变成另外一个人的借款,不断循环,债权债务链无限延伸,广义货币(M<sub>2</sub>)跟着膨胀起来。这种债权债务链的拉长是高杠杆化的一个方面,而M<sub>2</sub>巨幅膨胀正是高杠杆化的外在表现。泡沫化中,人们以资产作抵押融资。本来资产只值6元,但泡沫化中涨到20元,以它作抵押借到12元,实际就是6元钱借了12元钱。这是高杠杆化的又一个方面。泡沫化中,赚钱那么容易,银行不会让其做存款被提取准备金,做贷款接受利率管制。理财产品于是应运而生。理财产品让银行可以将储户的钱全部用于生

利,并且不接受利率管制。其它非银行金融机构也会尽可能地每一分钱都放出去生利。中国的理财产品从无到有,短短几年达到13万亿,非银行金融机构爆发增长,正是银行等金融部门在规避监管分享资产泡沫。这是高杠杆化的第三个方面。

在这个货币超发、流动性泛滥、虚拟经济过度发展的时代,世界经济可能伴随着热钱的国际流动此起彼伏周期性波动。这也意味着构建新的国际货币体系将在不久的将来重新提到议事日程。而在国际货币制度没有根本改革以前,对短期资本流动进行适当限制可能是必要的并且是有益的政策选择。货币制度出了问题,管制短期资金流动可能反而是经济自由。

(作者单位:浙江财经大学经济与国际贸易学院)



【缘木求鱼】

可以肯定的是,一个熟知孝悌之义的人绝不会制定出使“斑白者负戴于道路”的政策。

# 麻生太郎与杨教授的荒唐养老论

木木

据说,但凡有点儿文化学识传承的日本人,不管出乎真心还是假意,或多或少都喜欢摆出点孔孟之道正宗传承者、传播者的样子;尤其遇到那些把老祖宗丢到爪哇国里去的中国人,就更会挺起胸膛的胸脯来。久而久之,使得孔孟之道俨然成为日本的一个文化符号,并很让一些中国人自惭形秽起来。

不过,这种沾沾自喜的文化情绪,其实是很有似是而非的气味的。虽然这种味道早已附固于日本文化的骨髓深处,并扬名世界,但根据现实需要及自身好恶有所取舍的手腕儿,终非堂堂之道,很容易就会把前进的路径引领到另外的方向上去。就以孔孟之道而言,“仁爱”是最核心

的一个内容,而日本这个“好学生”,恰恰就对此进行了最充分的“扬弃”。如此论断,一点儿也不冤枉这个“夫子的衣钵传人”。

据日本人自己考证,日本古时候有把老年人弃置山林、任其自生自灭的风俗。如果说,在古代社会,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生存艰难,如此对待老年人实属无可奈何之举,尚能引人唏嘘一番,但到了现代社会,在早已跻身发达国家行列多年的日本,身为政府副首相的麻生太郎居然还能公开发表“希望(老年患者)能够快一点死”、以减轻政府财政负担的话,就颇有些让人齿冷并冷汗淋漓了。能说出这种话的人,还有什么事儿干不出来呢?

在退休老人的问题上,早些年,日本政府也曾本着“麻生思路”,很认真地

做出过不同凡响的大手笔,即鼓励退休老人们背井离乡到第三世界国家去“安享晚年”。如此看来,“麻生思路”绝不是麻生太郎的个人偏好,其中是很蕴涵着一些深厚的历史传承和文化传承的,在这个传承体系中,麻生只不过是比别人侧目的一朵小浪花罢了。

麻生一定是读过一些书的人,脑子里的各类知识应该不少;那些制定出“赶老人出国”政策的人,也一定读书不少,脑子里的各类知识也应该不少吧。读书人的现代称号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居然能说出这样的话、制定出这样的政策,还真有点儿让人无语可说,也难怪曾经有人生发出“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慨叹。其实,“知识”本身,无所谓好坏,是造福人类还是毁灭世界,全在于掌握它的是谁人了。

中日两国在地球村里是近邻,离得近了,“麻生思路”就难免会很快捷地“东风西渐”,甚而竟能寻得一些衣钵传人了。近日,以“50岁退休65岁领养老金;男做闺女洗衣”的言论,在网络世界很是红火了一番的清华大学教授杨燕绥,估计就颇得个中三昧。杨教授的研究成果公布后,面对网络上的汹汹议论,教授居然也能很强势地回应“为什么不可以?”这倒颇有些舍我其谁的“麻生气概”。

是啊,“为什么不可以”呢?这个问题一时还真难回答。如果,杨教授的老父母竟就是如此践行的,而杨教授自小耳闻目睹,竟也自然而然地打算身体力行之,那就更让人难以回应教授的质问了。

不过,私下揣摩良久,竟然觉得“男人不可以给别人做园丁、女人不可以给别人洗衣服”和“政府可不可以少发

几年退休金”之间,似乎还真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前者,做不做人自己的事儿;后者,这样做而不那样做,总应该有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但杨教授的理由,显然很难服众,但能不能服政府,还真不太好说。但值得庆幸的是,这个事件,彰显了杨教授们的“梦”,显然大异于中国广大的普通老百姓的“梦”。

2000多年前,“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斑白者不負戴于道路矣”是孟子的梦想。现在,不知执“庠序之教”的杨教授们还会不会对莘莘学子“申之以孝悌之义”。或许,那些故纸堆早就被扫进了杨教授们的垃圾堆吧。但可以肯定的是,一个熟知孝悌之义的人绝不会制定出使“斑白者负戴于道路”的政策。高高在上的知识分子,还是应该有些仁爱之心的吧。

(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



【平心而论】

电影与旅游的嫁接早就是世界性的“共生现象”。

# 从文化扶贫看旅游与电影的共生

汤亚平

笔者一直以为,媒体摄影师是从大自然美中发现自己的社会责任,而电影摄影师则是从社会责任中去寻找和发现大自然的美,二者殊途同归,造就了旅游与电影的“共生现象”。刚刚在贵州西江千户苗寨开拍、由深圳制造的电影《苗娃》,就是用镜头对这种共生理论的最好诠释。

深圳摄影师陶桃来到贵州西江,发现了一个双耳失聪的小女孩米往家有三兄妹,父母为了治疗米往的耳病,外出打工2年不回家,留在家的三兄

妹相依为命艰苦地生活着。米往的家庭引起了摄影师陶桃的关注,在陶桃的搭桥和帮助下,深圳一家慈善机构决定无偿为米往提供昂贵的人工耳蜗。米往的病治好了,她的妈妈爸爸又都回到苗寨,开了一家农家乐,为游人唱苗歌跳苗舞。米往幸福地生活在苗寨和父母的身边。

对于在深圳生活的人来说,苗寨是一个神秘的地方,它很远,远到可以想象出所有的纯真与美。对于在苗寨里面的人来说,深圳是一个遥远的城市,它很大,大到可以容纳所有苗家人的梦想。直到有一天,他们互相

走进了对方……这不仅是旅游与电影的“共生”,而且是特区与贫穷地区的“共生”。

就笔者所知,多年来深圳给贵州的对口扶贫资金当数以亿计,但这次旅游与电影的嫁接,将是文化扶贫最辉煌的一笔。

影视旅游产业的潜力一直被业界看好。看过《海滩》(《Beach》)、《迷失东京》(《Lost in Translation》)、《走出非洲》(《Out of Africa》)、《澳洲乱世情》(《Australia》)、《贫民窟的百万富翁》(《Slumdog Millionaire》)等电影的观众应该知道,电影与旅游的嫁接早就

是世界性的“共生现象”。

记得电影《指环王》曾让新西兰的游客增长了10%;《拯救大兵瑞恩》的公映,让到诺曼底旅游的美国游客增加了40%。而20世纪80年代中国电影《芙蓉镇》,吹响了民族文化旅游的号角,当时的中国旅游业远没有现在这么火,而湘西王村镇每天接待游客量在3000人次左右,最高峰达5000多人,对这个当时人口不足5万的小镇来说,电影《芙蓉镇》带来的无疑是一个聚宝盆。

到了20世纪90年代,湘西“剿匪”题材影视作品不断拍摄,《湘西剿匪

记》、《乌龙山剿匪记》、《湘西匪事》、《武陵山剿匪记》等,选择水顺“不二门”国家森林公园、猛洞河“天下第一漂”、吉首“德夯”、碧水如诗的“栖凤湖”、龙山“乌龙山”、“凤凰古城”等风光优美的地方作为外景拍摄地,宣扬了湘西风光,进一步推动了湘西旅游业的发展。

湘西题材的屡屡成功,给民族旅游资源大省贵州带来了启示,随着《苗娃》的开拍,千户苗寨、镇远古镇、清澈碧绿的舞阳河、变幻莫测的铁溪等神秘面纱将一一被揭开。

(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